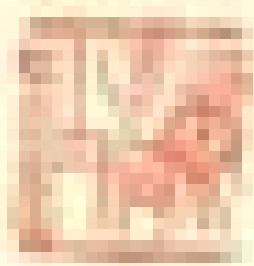


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



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



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 编

东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 译

徐喜辰 史维雍 校

三 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西安

(陕)新登字 006 号

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
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 编
东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译
徐喜辰 史维雍 校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西影彩印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3印张 5插页 327千字
1995年3月西安第2次印刷

ISBN7-80546-004-3/K·5
定价:4.50

译者前言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对工业、农业、商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意义，已被愈来愈多的同志所了解。但是，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似乎还未曾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殊不知掌握国内外的有关信息实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只有迅速而又准确地掌握国内外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信息，才能避免大量的无效劳动，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以适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本书日文本原名为《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是日本国为出席历届国际历史学会议而编写的一种报告书。内容包括日本国研究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的论著评介，由各方面的专家综合整理执笔编写而成。

这个译本，只是根据日文版翻译了该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这一部分，因而定名为《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全书分为殷周、战国秦汉、六国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五个部分，均按首先综合评介，后附相关的重要论著目录的形式，将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经济、政治、制度、军事、思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情况做了扼要的总结和深入的评述，能使读者窥见日本历史

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态度、方法和学风；对于日本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战后的研究情况亦能够有个鸟瞰式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把它作为资料索引而掌握其研究动态和信息；因而对于我国的古代史研究者说来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为了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我们采取“直译”的原则，除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解释性的译者注外，对原作中显然与我们不同的词语和观点等，都未作任何变动和批注，一仍其旧。例如原书中把中国史上的历代起义都称为“叛乱”，把南诏和暹罗并列为一个国家，把清朝、西藏、印度间的关系说成是国际关系以及把明、清称为国与国的外交关系等等，均都保持原样，不作变动，希望读者们阅读时注意。

原书的编写体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例外。如原书第一册中将法律史、思想史和宗教史部分单独成章，我们则把它作为附录编在全书的后面。又如，各册的注释，有的注明了出处的页码，有的未注明，我们无法统一，依样译出。

《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一书，前后计出五册，收录的文章，上限为1953年，少数章节也收录了1953年以前的文章观点，下限为1978年。该书的出版虽然距今已七、八年，但该书最早几册出版较早，加之在我国流传极少，若干年来，我国也没有专门介绍那一时期的日本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动态的书籍，因此，我们认为，将此书翻译出版，仍将会对我国历史学界提供信息和检索的方便。

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在汉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早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日本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等途径从中国传入了“汉籍”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参见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时的宫中讲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晋书》。后来，逐渐普及到日本国各地。《续日本纪》（797年完成的官撰史书）神护

景云三年云：“（大宰府——今福岡县）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并（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续日本后记》（869年完成的官撰史书）承和九年又云：“敕令相模（神奈川县）、武藏（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的一部分）、常陆（茨城县）、上野（群馬县）、下野（栃木县）、陆奥（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青森县）等国，写进三史”，便是其证。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国又开始翻刻中国史书。德川家康（1542—1616年）是位喜读《史记》、《汉书》的人，他的侍读也长于《资治通鉴》。德川光圀（1628—1700年）是水户藩主，由于受到《史记》的影响，开始编纂《大日本史》（397卷，1657—1906年完成）。大和郡山藩主柳泽吉保（1658—1714年）计划翻刻二十一史，从1701年起陆续翻刻了《晋书》、《南齐书》、《宋书》、《梁书》和《陈书》。在整个江户时代共计翻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和《五代史》等十四史，还有《宋史》、《元史》、《明史》的一部分和《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群书治要》、《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在此基础上，日本国逐渐开创了东洋史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史学的研究。明治二十年（188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首由岛田重礼开设了“支那历史”课，明治二十七年（1897年）在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东洋历史”，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在“中等学校教授要目”中列入了“东洋历史”。明治四十年（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了“东洋史学专业”，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也设立了“东洋史学科”。

日本国的东洋史学从汉学的束缚下独立出来,是从白鸟库吉、林泰辅否定尧舜禹存在的争论时开始的。白鸟氏在其《支那古代传说研究》(《东洋时报》131, 1909年)和《〈尚书〉的严格批判——关于尧舜禹问题》(《东亚研究》2—4, 1912年)中认为,尧舜禹是中国古代天地人三才思想的一种反映,《尚书》成书于春秋中叶,从而脱离了汉学影响,进入了史的研究领域。林氏在其《关于东洋史学界近来的新说问题》(《东洋哲学》17—1, 1910年)和《关于尧舜禹抹杀论问题》(《支那上代之研究》, 进光社, 1927年)中则说:从龟甲兽骨文字看来,中国从殷代起才进入了历史时代。从此以后,日本国逐渐走上了真正意义的中国历史研究的道路。

日本国的东洋史学的开拓者,计有那珂通世(《那珂通世遗书》, 大日本图书, 1915年;《支那通史》, 大日本图书, 1888—1890年)、市村瓊次郎(《支那论集》, 富山房, 1916年;《支那史研究》, 春秋社, 1939年;《文教论集》, 大仓书店, 1917年;《东洋史统》, 富山房, 1939—1950年)、白鸟库吉(《白鸟库吉全集》10, 岩波书店, 1969—1971年)、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全集》13, 筑摩书店, 1969—1973年)、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西域篇, 图书院, 1932—1933年;《剑峰遗草》, 春秋社, 1939年)、桑原隲藏(《桑原隲藏全集》5, 增刊, 岩波书店, 1968年)、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 岩波书店, 1963—1966年)、箭内互(《蒙古史研究》, 刀江书院, 1930年;《东洋读史地图》, 富山房, 1943年)、稻叶岩吉(《清朝全史》, 早大出版部, 1914年;《支那政治史纲领》, 早大出版部, 1918年)、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 东洋文库, 1931年;《满鲜史研究》上世二册、中世三册、近世, 祖国社、吉川弘文馆、图书院、中央美术, 1951—1972年)、加藤繁(《支那古田制研究》, 京都法学会, 1916年;《唐宋时代的金银研究》,

东洋文库，1925—1926年；《支那社会》，岩波书店，1935年；《〈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岩波书店，1942年；《〈旧唐书·食货志〉、〈旧五代史·食货志〉译注》，岩波书店，1948年；《支那社会经济史概说》，弘文堂，1944年；《支那社会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2—1953年）、滨田耕作（《东亚考古学研究》，图书院，1930年；《考古学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0年；《东洋美术史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2年）、羽田亨（《元代驿站杂考》，东洋文库，1930年；《西域文明史概论》，弘文堂，1931年；《西域文化史》，座右宝刊行会，1948年；《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2，京大东洋史研究会，1957—1958年）等人，他们的论著涉及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论述和研究。

继上述老一辈学者之后，日本国内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曾经出版有大量的论著，欲知其详，请参阅下列有关介绍包括研究中国历史论著在内的东洋史学研究动态方面的书籍，例如小仓芳彦的《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岩波书店《世界历史》20，1971年）、五井直弘的《近代日本与东洋史学》（青木书店，1976年）、《历史学界的回顾和展望——1949到1981年》1—33册（山川出版社）、东洋文化学院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东方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思想宗教史研究会的《中国思想宗教文化论文目录》（图书刊行会，1976年）和东京国立文物研究所美术部美术研究所的《东洋美术文献目录》（中央公论美术出版部，1971年），等等。其中虽然有些尚需商榷之作，但是确实也有不少论著对于我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日本国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池田雄一教授复制惠赠了《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一书的一至四册，得到了我校科研处处长马国臣、系主任朱寰和教研室

主任田泽滨诸同志的关怀和支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玉良同志参与了最后的编审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教师 and 研究生詹子庆、胡方恕、程志、韩斌娜、穆鸿利、喻鑫、王德忠、宫长为等同志译出，由史维雍同志做了全书初校，我做了复校和最后定稿工作。限于我们的日文水平，虽然对译稿作了几次校订，错误和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徐喜辰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长春

目 录

译者前言

壹：殷、周.....	(1)
一、——1957年.....	(1)
二、1958年——1962年.....	(11)
三、1963年——1967年.....	(18)
四、1968年——1972年.....	(26)
五、1973年——1977年.....	(35)
贰：战国、秦、汉.....	(47)
一、——1957年.....	(47)
二、1958年——1962年.....	(62)
三、1963年——1967年.....	(72)
五、1968年——1972年.....	(86)
五、1973年——1977年.....	(101)
叁：六朝、隋、唐.....	(117)
一、——1957年.....	(117)
二、1958年——1962年.....	(130)
三、1963年——1967年.....	(143)
四、1968年——1972年.....	(157)

五、1973年——1977年	(182)
肆：五代、宋、辽、金、元	(200)
一、——1957年	(200)
二、1958年——1962年	(218)
三、1963年——1967年	(232)
四、1968年——1972年	(252)
五、1973年——1977年	(270)
伍：明、清	(285)
一、——1957年	(285)
二、1958年——1962年	(297)
三、1963年——1967年	(313)
四、1968年——1972年	(341)
五、1973年——1977年	(369)
附 录：	
一、法制史研究	(389)
二、思想史研究	(397)
三、宗教史研究	(405)

壹 殷、周

一、 —1957年

殷周史的研究工作，从其史料的性质看，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以古籍辨伪为中心的，以及考察古代文献的形成过程的；第二种是着重研究思想史的；第三种是历史方面的研究，这又可以分成以甲骨文、金文等出土史料为中心的，及以古代文献为中心的两种。其中的第二种，除特殊有关者外，都留待附录的思想史项内叙述。至于上述的第一种与第三种，如按时代划分，以甲骨文和金文为最古，以古文献为中心者次之，因此本稿决定按照时代顺序进行展望。

以甲骨文与金文为史料进行研究，早已受到林泰辅与内藤虎次郎等人的注意，并被他们应用到研究历史中来，内藤虎次郎的《支那上古史》①、冈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说》上册。《支那古代史纲要》②等等概论性书，就是采用了其初期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

但是，内藤、冈崎仍然是以古文献为主，而受到这一影响的贝冢茂树，竟进一步开辟出了索性以同时期的出土史料即以甲骨

文与金文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他的《关于殷代金文所见象形文字**癸**》^③，是将殷王朝的重要组织即以王子为中心的多子族的性质，看成是按年龄长幼而划分的阶级；《殷末周初的东方经略》^④，是根据山东省梁山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论述了从殷到周之间与东方的关系；还有《西周时代的罚款征收制度》^⑤，是通过征收罚款的制度来考虑西周初期与后期的统治关系的变迁的。为了将这些甲骨文与金文作为史料来用，必须先对该史料本身进行基础性研究，为此，贝冢将中国人所作出的研究，特别是编年方面的研究，作了批判与补正后，将其成果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⑥为题发表出来，他后来还在甲骨文方面与伊藤道治共同发表了《再论甲骨文断代的研究方法——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为中心》^⑦。贝冢的《中国古代史的发展》一文，成了将战后（日本）的甲骨文与金文研究推向兴旺的基础，也成了日本人研究中国史的划时期的著作，这一点他的功绩甚大。

断贝冢之后，白川静发表了《殷代的社会基础》、《周初的殷人活动》、《殷的王族与政治形态》、《殷代的殉葬与奴隶制》、《小臣考》^⑧等一系列的研究论著，他将殷的社会结构论述成是类似日本的“部”的、按职业来划分的氏族的集团，而尖锐地批判了正在中国成为流行说法的奴隶制度说。白川的研究是靠运用颇为详细的资料进行的，他后来所发表的《甲骨金文学论丛》初集至九集^⑨，也给中国史的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益处。白川的研究，是以阐明社会结构为中心，而将占甲骨文大部分的祭祀材料作为制度来研究的，则有岛邦男的《祭祀卜辞研究》^⑩，他将出现于甲骨文中的祭祀记录按照月日排列后，发现了五种祭祀都是对直系祖先的王与王妣，按照世系顺序，规则严正地进行的。其后岛氏又将甲骨文的研究加以发展，并将他对殷王朝的地理范围、历法等等的研究合在一起，写成了《殷墟卜辞研究》^⑪发表。

另外，在研究这一时代的祭祀方面，现在盛行对甲骨文用民族学的方法来解释当时的祭祀观念，池田末利的《俳优起源考》、《鬼字考》^⑫、赤冢忠的《殷代的祭河及其起源》、《殷代的祭筮》^⑬，伊藤道治的《卜辞所见的祖灵观念》^⑭等等是其重要者，这种方法除我国外，几乎未运用过，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也将成为一大课题。上述这些殷代史的研究成果，连同中国人作出的研究一起，都已被归纳到贝冢茂树的《古代殷帝国》之中，该书是一本重要的研究殷代史的入门书。

另一方面，金文本身的研究，由于更重要的是它与古代文献的关联，以及因为战后中国新出土的史料尚未整理出来，所以没有太大的发展（按：这里指日本国对中国新出土史料的整理），但是，伊藤道治的《新出西周金文编年诸问题》^⑮，既整理了金文编年的有问题处，同时又使上述贝冢茂树的《殷末周初的东方经略》一文得到了发展，并对宫崎市定所提出的，将西周时期看成是由传说构成的、缺乏真实性的时代的说法做了批判^⑯，它是一部企图开拓出一种根据出土史料来研究西周政治史的方法的著作。此外，内藤戊申的《金文札记》^⑰，是企图从金文出发，将青铜器按用途进行分类的著作，这是从来未曾作过的研究。

上述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因为资料本身都是出土史料，怎样与考古学进行综合研究，就逐渐被重视起来。在这一点上，冈田芳三郎的《中国古铜器的传世问题》^⑱、樋口隆康的《新发现的西周铜器群及其问题所在》^⑲、伊藤道治的《安阳小屯殷代遗迹分布的复原及其问题》^⑳都不单单是考古学，同时还牵涉到甲骨文与金文，而且在研究当时的祭祀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有价值的见解，这种方法给最近的殷、周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其未来的发展令人瞩目。再有，《甲骨学》^㉑杂志是研究甲骨文与金文的一本专业杂志，因而已受到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

其次，看一下对文献本身的研究情况。这方面的研究，因受到日本自古以来汉学传统的影响，一直是以有关儒家经典十三经为其中心的。总论性的研究，有内野熊一郎的《秦代对经书经学的研究》、《今古文源流的研究》^②。只以一种古文献为主的研究，《尚书》方面有中江丑吉的《尚书概论》、《尚书二十九篇之我见》^③，贝冢茂树的《关于〈尚书·大诰篇〉的作者》^④等等；还有不将重点放在《尚书》本文，而放在校订后人的注释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的《尚书正义定本》^⑤及其日文译本吉川幸次郎的《尚书正义》^⑥，它们和与礼有关的加藤虎之亮的《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⑦、常盘井贤十的《宋本礼记疏校记》^⑧以及将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⑨加以订补的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⑩一样，都是不仅在研究古文献本文方面，同时在研究各个时代所作的注释方面也应该作为最为基础的巨作而受到注意。

此外，川原寿一的《仪礼释考》^⑪以专门解释《礼》中最为难解的《仪礼》而受到注意。《论语》方面则有北村泽吉的《论语义注及集义》^⑫，研究其成书经过的有津田左右吉的《论语与孔子的思想》^⑬、武内义雄的《论语之研究》^⑭，等等，特别是后一著作，又发展为贝冢茂树的《论语的成书经过》^⑮和《孔子》^⑯。贝冢的说法，看来也受到了加藤常贤《礼的起源及其发展》^⑰一书的影响。加藤的研究，是从宗教民族学方面来研究礼的原始意义的，他试图在血缘集团的宗教礼仪之中，寻找出后来成为国家政治观念的儒教的基础，因而是值得注意的看法。再有，儒教等等的各种思想，都是从春秋后半期起，才形成各种学派传承发展起来的，考察这些学派性质的有宇都宫清吉的《孔子学团》^⑱、增渊龙夫的《墨侠》^⑲等。

在研究《诗经》方面，有松本雅明的《关于诗经各篇写成经过的研究》^⑳，他不仅研究了诗经的写成经过，还一面与日本的

诗歌等等进行比较，一面涉足于从民族学方面来研究祭祀。此外，白川静的《诗经所见之农事诗》^{④①}，是试图考察西周经济结构的，因而是一篇重要的研究作品。

再有，以儒教的古文献特别是以《礼》与《尔雅》为中心的加藤常贤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研究》^{④②}，和上述的该作者对《礼》的研究，同是运用民族学、社会学的方法对古文献进行详细考察后才作出的重要研究，它追寻了中国的家族形态从氏族形态向单个家族演变的过程。

用上述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献的基础性研究作为根据而进行的研究之中，受到新城新藏影响而写出的能田忠亮的《礼记月令天文考》^{④③}、能田忠亮、藪内清合写的《汉书·律历书研究》^{④④}、藪内清的《殷代的历法》、《有关殷历的二三问题》^{④⑤}等篇，是从天文学这一特殊立场进行的研究，对于决定殷、周的真实年代，或阐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起源与发展，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还有，曾发表过《有关殷代产业的若干问题》、《殷代的农业及其社会结构》、《西周的农业及其社会结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④⑥}等等的天野元之助的研究，是从农业史的角度对从上述基本研究中得到的甲骨文、金文、古文献的史料加以考察后写出的，因是具有特色的重要研究成果，很受人们的注意。

最后是历史方面的研究，下面着重概述一下战后成为重大问题的项目。其中一个是有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问题，这是宫崎市定在《中国古代是封建制还是城市国家》中所提出的问题，宫崎的这一说法又发展成《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④⑦}以及贝冢茂树的《孔子》和《关于中国古代的民会》^{④⑧}，他们都拟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定为城市国家。贝冢在后一文中指出了当时中国城市工商业者曾经参予了政治的史实，并在前一文中说殷与西周时代存在于各地的国家，都是由城墙围绕起来的国家，周室的统治权则是建立在这些城市国家群的联合体上的，并认为其联合的